

在新竹市東郊的印順導師與當代人間

江燦騰

—淨土思想的大爭辯及其新開展（二）

壹、前言

近三十年來，在臺灣各地佛教道場盛行的人間佛教淨土思潮，不僅在當代臺灣各地、甚至在香港和大陸地區，都是不少佛教學者論述的熱門課題；而與此相關的教界人士和著名道場，也都紛紛各自標榜新創的詮釋術語和本身思想的源流與依據。

因此，當代人間佛教的思想潮流，是既廣泛流行又涵義分歧的當代新佛教意識形態之特有氾濫現象。這雖不是對新竹市佛教界所特別產生的影響，卻也無法例外，而不受其影響，例如釋寬謙比丘尼，就是當中最著名的實例之一，她不但一直弘揚印順導師的著作與思想，連福嚴佛學院的大改建時，也都由她一手包辦全部設計。因此，我們絕對有必要針對此思潮與印順導師（一九〇六—二〇〇五）的關係之間，進行必要的解說，才能知道整個事件發展的來龍去脈。

但是，人間佛教的思想潮流中的核心概念及其相應的社會實踐趨勢：佛陀的非超人化和佛教的入世關懷，

其實是與戰前的近代化趨勢和社會主義思潮在東亞逐漸流行的各類實踐化表現，具有密切的關聯性。

因此，事實上，一九三六年之前的大陸佛教界不少改革派人士和日治下的臺灣佛教知識菁英間，彼此都有多次的思想交流，雙方甚至都具有高度的近代思想同質性內涵。¹

可是，由於一九三六年後的東亞戰爭，逐漸促使各類思想朝向包裹民族主義外衣的法西斯化、亞洲統合論和唯物社會主義思想的三者之混合時潮發展。

唯一例外的是，當時還在大陸地區的傑出佛教思想家印順導師。由於他在戰時，曾對印度佛教滅亡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而後又溯源性地引述原始佛教的相關佛經典據，並提出印度佛教思想流變的新詮釋體系，所以大量具有近代性反思性質的傳統經論新解論述，也逐漸流傳各地。而當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大局底定之後，他又先是逃離到香港；之後，從一九五三年起，再長期定居於臺灣新竹、臺北、臺中、嘉義等地，直到二〇〇五

年過世於花蓮。因此之故，也帶來他最具典範性的新佛教思想的認知內涵和多元視野。

不過，人間佛教的思想潮流，之所以能在兩岸三地成為不少佛教學者論述的熱門課題，其實是根源於臺灣解嚴前後的特殊社會轉型期的新思維的產物，並且筆者和楊惠南兩人，是初期最重要的推廣者；其後，印順與太虛（一八九〇—一九四七）的差別和新舊淨土思想的不同實踐路線之爭，就成為佛教界各自論述的主要源頭。

而其中，佛教兩性平權、生態關懷、國際急難救助和現代弘法，則是臺灣教界目前的主要成就。受此影響，大陸佛教界人士，也不甘示弱，紛紛提出趙樸初（一九〇七—二〇〇〇）與太虛的人間佛教思想論述。所以，目前此新（意識形態）的思潮，仍在兩岸三地，各自繼續分歧發展。

但是，為何會出現印順導師與當代淨土思想的大爭辯及其新開展？本章就是在解說此事情來龍去脈。又由於筆者本身，不但是作為研究當代臺灣佛教史的學者；在此同時，長期居住在新竹地區的筆者，又是實際介入歷史發展的相關「局內人」之一。所以，在親自現身說明之餘，也可能有當局者迷的認知盲點。因此，本章只

是代表筆者的一家之言而已。



筆者（右起）、性廣法師、昭慧法師、悟殷法師，與印順導師（中坐者）合影。

照片說明：筆者（右）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當代臺灣人間佛教思想家》一書（台北：新文豐），為印順導師祝壽。（右二）是釋性廣比丘尼，她接受我的建議，正式提倡人

間佛教禪法，並出版專書，由筆者寫序。（左一）釋悟殷比丘尼，她開始按印順導師的觀點，出版部派佛教專書。（左二）釋昭慧比丘尼，她是受印順導師的戒律思想的啟發，出版關於佛教女性戒律學觀點的專書。這是當代關於印順導師的人間思想詮釋的高峰期，也是當代最具佛教思想影響力的大擴散期。而筆者的書，也在大陸被不少學者閱讀。日後，更因此，有大陸佛教學者張雪松博士，還將筆者和北大哲學系教授樓宇烈先生相提並論。所以，我們四人，當時都一起到台中縣的太平市華雨精舍，與印順導師本人合影。

貳、相關歷史溯源

一、先從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印順導師與筆者在新竹的一次對話說起

雖然在臺灣當代的佛教學術圈，並不缺乏學有專長的佛教學者。但是，在二〇〇五年之前，要像印順導師那樣，幾乎受到僧俗兩眾，一致推崇的佛教學者，並仰之為當代佛學最高權威者，可謂絕無僅有。

不過，論世俗名聲上，他比不上南部佛光山的星雲法師，甚至也比不上他門下的證嚴法師。但是，在真正的佛教學術研究圈裡，卻唯有印順導師一人，能具有一言九鼎的公信力。

也因為如此，在臺灣的佛學界居然出現一種有趣的現象，即：有不少佛教道場，經常會對外界表示，他（她）們奉印順導師為「導師」；而印順導師的佛學見解，就是彼等修行的最高指導原則。換句話說，在當代臺灣的佛教學術界裡，掛印順導師的「招牌」，已經成了一種新的流行。

本來，佛法的流布，就是要深入廣大社會的，並非只是出家人自己關起門來說說而已。所以當年佛陀在菩提樹下，悟得無上的解脫道之後，隨之而來的，是遊走四方，傳播所悟正道；不拘對像，不論種性、貧富、賢愚，凡有所求法者，無不一一為其決疑和開示，務必使其蒙受法益而後已。

總計佛陀從三十五歲悟道到八十歲入滅的四十五年間，弘法、利生，即是他行道的主要宗旨，也是他實踐佛法的主要方式。

從這個角度來看，印順導師，自二十五歲出家以來，就在佛法中薰習和成長；而自二十六歲撰寫〈扶擇三

時教》和《共不共之研究》於《現代僧伽》以來，也已經歷了近幾十年頭的弘法生涯。

他的《妙雲集》和其他多種傑出的佛學著作，質精量多，幾乎涉及到經、律、論三藏的每一層面，堪稱一套小型的「三藏」寶典，為傳統佛學和現代佛教思想，建立起一條寬坦的溝通橋梁。

對於這樣的佛教高僧，身為佛教徒或佛法的愛好者，能閱讀他的書、以研討他的思想為榮，毋寧是很值得稱許的。而筆者自一九七一年起，便因工作的關係，長期定居新竹縣竹北迄今，也常常讀他的相關書籍，並逐漸寫過不少有關他的著作。²

可是，一開始，還未認識印順導師本人。筆者是先認識住在新竹市南門街的一位翻譯日本佛學著作的東北籍人關世謙先生，之後才有機會認識印順導師本人。

那時關世謙先生還在新竹市議會擔任秘書，也常在佛教期刊上發表譯自日文佛學的文章發表。他和個子嬌小的妻子，是住在新竹市南門街的一棟老舊日式平房宿舍內。關世謙先生也是一九四九年大陸變局而來到臺灣新竹的，又是虔誠的佛教徒。所以對於大陸僧侶在當地的活動，他都熱心參與，熟知來龍去脈。

而筆者當時，一方面在新竹縣竹北鄉泰和路的臺灣

飛利浦電子公司竹北廠的廠務部擔任機房操作員，負責氧氣製造，另一面又在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就讀，專攻明代佛教史。

有一次，筆者曾從臺大圖書館複製日本佛教學者阿部肇一的《中國禪宗史》增訂版給關世謙先生翻譯，其後此譯本是由三民書局的東大出版社出版的。

因為這樣的關係，筆者常從竹北家中騎機車到關世謙先生的南門街宿舍。

當時，還是在臺灣政治解嚴的初期階段，但先前管制思想的環境已大為開放了。

當時，臺灣知識菁英的活躍表現，有《當代》、《中國論壇》、《思與言》等刊物，可以暢所欲言。而筆者主要是在《當代》上發表。

其中，有一篇是筆者討論臺灣佛教高等教育的問題，並特別指名當代臺灣佛教界首席佛學權威印順導師本人，應在有生之年，針對新儒家大師牟宗三的《佛性與般若》中，所針對印順本人觀點的批評，有所回應。而不應留下未解的問題，讓像筆者等這些後輩學者來煩惱。³

沒想到，有一天，筆者去關先生家，關先生剛從新竹市東郊丘陵上的福嚴佛學院回來，他是去參加印順導

師的生日慶祝會的。

但，他告訴筆者，來參加導師生日慶會的人很多，可是導師一個人坐在沙發椅上，手裡拿著《當代》雜誌，正認真讀筆者的文章。關先生對他說，他認識作者。結果，印順導師拿著《當代》雜誌給關先生看，嘴裡一直在抱怨著：「你看看，你看看，還居然要我和牟宗三辯論……」。

筆者頓時恍然大悟，任何學者都是重視自己的學術思想，在專業同行中的看法。所以，他對生日活動是否熱鬧，一點也不在乎。他在乎的是，筆者居然丟給他一個傷腦筋的學術課題！

後來，印順導師本人，也親筆給筆者一封信。所以，筆者知道，他是把我當知音的，因此，他對筆者特別客氣，態度也和對其他人不同。

記得他九十二歲那年，筆者到福嚴看他。因假日大門關閉，等通報後打開。筆者進去時，抬頭一看，當年九十二歲的他，居然在二樓的走廊上，一手扶著鐵欄杆，一手對筆者揮舞，表示歡迎，令筆者無比感動。也就是在這訪談中，他坦承，並不反對共產主義，認為那是人類的理想之一，所以無須反對。但，他反對用殘酷的手段來傳播共產主義。

不過，在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的一次聚會中，印順導師本人卻對我個人談起他的著作被濫引濫用的情形。他還感嘆早期來臺灣，有心教卻找不到程度好的學生來學習，以後又因身體弱，無法將內心所想的一一寫出。

因此他認為，他在臺灣佛學界的影響力一定很弱（※當時在場的，還有來自臺南妙心寺的傳道法師。我們都是來參加福嚴佛學院的改建落成典禮，才與印順導師碰上的）。

不過當時，筆者隨即對他表示：在臺灣，他的書已成為當代知識份子，要接觸佛教思想的最佳媒介，即連一些新儒家的年輕學者，也多多少少讀過一些。因此他的佛學影響力，是無可置疑的。

然而，真正能對他思想做深刻掌握的，並不多。換句話說，當代的臺灣佛學水準，儘管有印順導師的著作可讀，由於理解不精確，很難評估提升多少。這樣的狀況，到底要怎樣扭轉，便值得探討了。

另一方面，筆者之所以要慎重其事地，重提這一段關於當代臺灣佛教界對印順導師的矛盾影響現象，其真正用意是，是想藉導出一個相關的論述主題。

亦即，我們可以由此發現，當代整個臺灣佛教界的

學術水準，其實並不如想像中那樣高，而事實上這又是印順導師再臺灣已經經營了近幾十年的結果。可見他過去的努力，是何等地艱辛、何等地不易。

再換另一角度來說吧！我們都知道有一些佛學界的同道，相當同情一九五三年到五四年之間，印順導師因《佛法概論》被檢舉為「為匪宣傳」的這件事。甚至有些學者（如楊惠南教授）還把此事，當作印順導師遭受保守派迫害的實例。同時，也批判包括慈航法師在內的教界領袖。

於是有個新的研究結論提出：認為臺灣戰後的佛教發展，所以水準尚未大幅度地提昇，是由於印順導師受迫害，以致失去其領導性的地位，連帶也喪失原可循印順導師思想發展的大好機會。總之，在《佛法概論》這件事上，印順導師不但被當成受難的英雄，也使保守派必須擔負了佛教發展落後的嚴重責任。

然而，我當時認為，如果我們繼續環繞著這件事打轉的話，可能對整個印順導師的時代角色與地位，會判斷不清。

因為從事件的過程來看，印順導師並未遭逮捕，或被監禁，甚至連限制行動的禁令也未發出，僅是在處理上，有警總和黨部介入，且要求對某些關於北拘蘆洲的

描寫作修改而已。

其後印順導師在經營道場和弘法活動上，一點也未遭到官方的干涉。所以我們如果太過強調此事的迫害性質，則有可能會誤導判斷的方向。做為一個現代佛教學者，在觀察此一事件的本質時，不能太感情用事，應該用較深度的視野來分析才對。這是我在展開以下的說明之前，首先要強調的一點。

（未完待續）

註釋：

1. 江燦騰，〈大正後期臺灣僧侶首次參與國際交流和兩岸佛教的互動及影響〉，《臺灣佛教史》（臺北：五南出版社，二〇〇九），頁一九三—二三六。
2. 江燦騰，〈人間淨土的追尋〉（台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3. 江燦騰，〈為臺灣佛教高等教育把脈〉，載《當代》第三十七期（臺北：一九九一，三月），頁一〇〇—一〇六。

智慧法語

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即見本性，即名佛。